

《玄空经》作者郭友松生平交游及著述考论*

孙 逊

内容提要 《玄空经》是继《何典》之后又一部吴语讽刺小说的代表，但长期以来对这部作品关注不够，对其作者所知更少。如何对其作者郭友松的生平交游作全面的考索，对其散见于报刊的著述作深入的探讨，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郭友松，并将其定位为社会转型时期一个集传统文人、民间才子和西馆报人于一体的近代知识分子的典型，是学术界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关键词 郭友松 《玄空经》 文人典型

清光绪年间，上海民间才子郭友松创作的《玄空经》，是小说史上一部很有特色的作品。此书吴中介士（郭友松）自序署“光绪甲申年”，甲申为光绪十年（1884），应为其成书时间。此书纯用属于吴语系统的松江方言写成，通篇寓意丰富，妙趣横生，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可以说是继《何典》之后我国又一部杰出的吴语讽刺小说。但长期以来，学界对这部作品关注不够，对其作者郭友松所知更少，特别是有关他的生平著述发掘不多，关于他的一些资料多为民间故老口耳相传的异闻轶事，缺少可靠的依据。本文拟就这方面做一深入的探讨。

一 关于郭友松的生平事迹

较早关注到《玄空经》作者郭友松的学者是叶德均先生，他早年出版的《小说琐谈》中专门写有《玄空经作者郭友松》一节，最先挖掘出张文虎《怀旧杂记》、《舒艺室诗存》、《舒艺室尺牋偶存》，以及张鸣珂、黄式权笔记中有关郭友松的材料，使我们对其有一个粗浅的了解。但由于受材料限制，很多问题还无法确定。例如他的生卒年，最早发现此书的现代书法家白蕉在其整理的1933年排印本中，收有署名献子（白蕉别号）的《郭友松》一文，但对郭友松的生卒年只字未提。叶德均先生根据南汇文人张文虎《舒艺室尺牋偶存》中所收两篇答郭友松的信件，推测“张氏二札作于道光二十四年及二十六年，假定那时他二十多岁，到同治十二年举乡试已在五十岁左右，其生年当在道光初，卒年不详”^①。《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等或记郭友松“生于道光初年（1822前后）”，“卒于光绪中（1889前后），终年六十八岁”，或记为“郭友松（1822？—1889？）”^②。此外，松江地方志中则记为1820—1887。以上记载之所以都不太确定，就因为都没有找到确凿的材料依据。

当年，白蕉先生和叶德均先生等为条件所限，难以查找浩如烟海的近代报刊，现在由于检索方便，一些线索慢慢浮出水面。例如《申报》中就有关于郭友松生卒年的线索：1887年4月6日《申报》刊

* 本文为上海市高校一流学科“中国语言文学”成果。

① 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下册《小说琐谈·玄空经作者郭友松》，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20页。

②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743页。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69页。

有《云间郭友松先生七十征诗，勉成一律，以介眉寿，并乞诸大吟坛正之》一诗：“寿星朗朗照江隈，多少耆英共举杯。白发信堪辉故里，黄金谁与筑高台。如君不愧松为友，独我空将诗作媒。正值蟠桃花似锦，五茸翘首即蓬莱。”诗后注云：“寿郭友松孝廉七十。友松先生以文雄海内，景其名者几有司马相如恨不同同时之感。而先生老当益壮，神明不衰，月之初四日，为先生七十寿辰，先一日同人觞于沈氏啸园，并有歌咏承索。俚句愧不成诗，聊申嵩祝而已。”同年12月15日，《申报》上还有署名“海上狎鸥客廖寿山拙草”的为郭友松七十寿辰祝寿的诗，称说郭友松“年跻七十耳不聾，喜听雅颂歌国风。腰脚卓荣行春容，登山不用扶枯筇。观书细字明双瞳，霍如岩电光熊熊。朵颐至收牙齿功，甘脆春韭兼秋菘”。看来他七十岁时身体还很硬朗。

根据以上材料，他的生年比较明确，从1887年上推六十九年（七十寿辰应是虚岁），应是1818年，而且生日也很明确，是农历四月初四日。卒年不能确指，但根据祝寿诗内的描述，起码至1887年七十岁时还很健康：耳不聾，腰脚硬，双目明，牙齿好，他的寿命应该还有较长一段时间。所以其生卒年不妨定为1818—1887年以后。

郭友松名福衡，自署娄县老福，清松江府娄县（今上海松江）人。父名郭权，字柳村，为诸生，善医。根据张文虎《怀旧杂记》记载：郭友松年少时，“未冠游庠，有神童之目。性蹇弛好奇，文亦如之。李小湖学使特赏异，延入幕。未几辞归，以卖画自给，不问世事。岁科试率首列，而秋闱屡荐屡蹶，同治癸酉始登贤书”^①。这是有关他一生比较简要而又可靠的记载。从中可知他早年命运淹蹇，曾长期困于场屋。此外，根据张文虎的其他记载，他还曾出过远门。他原计划去徐州，张文虎有《送郭福衡之徐州》二诗：“孤蓬正摇落，鸢鸟野踟蹰。拔剑出门去，关河风雪俱。良无妻子累，岂为利名驱！策马重回首，平安忆守株。”“若过淮阴市，相逢慎带刀。艰难穷士泪，意气少年豪。日落黄河冻，云飞芒碭高。衡斋应折节，今古几绨袍！”^②诗中洋溢了对郭友松作为“艰难穷士”和“意气少年”的同情和激赏。但在赴徐州途中经过苏州和扬州时，其间遭遇颇为窘迫。张文虎写于丙午（道光二十六年）《答郭友松》的信中说到：“客冬得陈颖庄来书及筱峰所述，足下在苏光景略知之矣。苦寒行役，殊系人怀。月初八日接手告，则审留滞维扬，进退维谷。行路之难，动足即是，何必天涯。知其难者，当于无可立足中求立足之地。向者相阻之意，足下知之矣。抑知所以相阻之意乎？盖足下视事太易，视去就太轻，致有此悔。然既在扬州，何不即扬州谋席地？以足下之才，龙性稍驯，岂无遇合？可止则止，何汲汲往返为。弟意徐州未必即有信，即信至，未必竟具行李以迎。既抵徐州，复欲借省试为归计，恐无说以处此。即有说以处，而几月徐州官舍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耶？如决计不欲居徐，莫若即今勿往。然在外情形，难以逆料，足下且以弟言熟思之，而度之以势，徐定行止可耳。”^③道光二十六年为1846年，当时郭友松二十八岁，只身外出，本是想去徐州，张文虎还为他写了送行诗。一路上他先至苏州，“苦寒行役，殊系人怀”；继而“留滞维扬，进退维谷”；这时他给张文虎写了一封信，告知其窘状，希望能得到作为父执辈的张文虎的指点和帮助。很快他便收到了张文虎的回信，信中既充满励志之语，又为他耐心分析所面临的人生选择，一个长辈对后辈的关爱之情溢于言表。郭友松后来是去了徐州还是继续留在扬州，我们暂时不得而知，但信中所透露的他困顿于人生旅途的窘迫情状让人唏嘘不已。

但尽管郭友松命运淹蹇，生途窘迫，他于“同治癸酉”还是“始登贤书”。癸酉为同治十二年

① 张文虎《怀旧杂记》，光绪癸巳（十九年，1893）九月刻本，卷三，第7页。

② 张文虎《覆瓿集·舒艺室诗存》，同治十三年（1874）冬十月金陵冶城宾馆刊本，卷三，第19页。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续修四库全书》。

③ 张文虎《舒艺室尺牍偶存·答郭友松》，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第620页。

(1873)，“登贤书”谓考试中式。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中也记载他为“诸生，后中同治癸酉举人”^①。也就是说，郭友松至1873年五十五岁时才中了举人。此前他究竟考过多少次，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但《张文虎日记》透露了一些消息。现存张氏日记始自同治三年九月十五日（1864年10月15日），终于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1873年1月28日），记录的大体是他在金陵书局八年的生活和学术经历。其间多处记录了与郭友松的交往，有一些似和郭赴金陵参加科考有关。如同治三年（1864）十一月初三、初六两日，均有记“访郭友松、尹子铭、朱雨苍寓，不得”、“至奇望街访郭友松，不值”。同月十一日、十四日，则有“天寒，士子多有不进二场者”、“闾中委员、号军有冻死者，监临李官保亦于二场点名时中寒猝病，发热谵语，不省人事”等记载，同月十六日有“郭友松来”一语^②。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则有“托杨见山往看榜，相识中仅芜湖吴子百中百九名，华亭潘秋山中百三十一名，歙方春伯中百四十二名，江都刘恭甫中副榜二十七名，四人而已”^③。看来这一次郭友松就是为赴科考而来金陵的，而结果则是名落孙山。又同治五年（1866）十月初五日，日记中记有“铁皮船至，送到姚衡堂先生回信……附郭友松信，言两列优等，以年例出贡试，后夫妇俱病”^④。这一年科考结果日记中没有记载，而且夫妇俩还都生了病。又同治六年（1867）七月二十日，记“郭友松来，云住三条营，午饭去”。二十七日又记有“往考市晤二泉、叔文、于石、王伯承、徐古香……张十洲、席仪亭、郭友松、周孟舆，因与友松、孟舆回顾楼街茶话”^⑤。看来这次也是和松江一批考生同赴金陵参加科考，最后也是没有结果。这一年郭友松已虚岁五十，年过半百，真所谓“岁科试率首列，而秋闱屡荐屡蹶”。后来郭友松虽五十五岁中了举人，但一生潦倒，其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经历了太多的失败和痛苦，而且后来即便中举，似也没有进入仕途。

在这期间，他先是入李小湖幕。张文虎《秋日怀人诗》内有怀郭友松的诗：“病鹤褊褊困不支，别材偏遇道林师。成巢此去青松顶，满眼荆榛莫踏枝。”诗下注云：“郭福衡。君穷不能自振，李小湖学使独赏异之，延入幕。”^⑥此诗从诗意看，应是郭友松已入李小湖幕，故而张氏在秋日怀念起他。所谓“道林师”、“青松顶”，都是指李小湖和李小湖幕。此诗没有明确系年，但按此诗前面所录有系年诗来推算，应为丁巳年，即1857年，此时郭友松三十九岁，他入李小湖幕的时间应在此前。但他“未几辞归，以卖画自给”，或在家“课徒自给”^⑦，都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自食其力。

后来，他进入上海墨海书馆工作，和王韬、李善兰、蒋剑人、管小异共过事。王韬在《弢园老民自传》中记述：“西馆中，时则有海宁李壬叔、宝山蒋剑人、江宁管小异、华亭郭友松并负才名，皆与老民为莫逆交。惟是时事日艰，寇氛益迫，老民蒿目伤心，无可下手，每酒酣耳热，抵掌雄谈，往往声震四壁，或慷慨激昂，泣数行下，不知者笑为狂生，弗顾也。”^⑧传中云此时“时事日艰，寇氛益迫”，应该正是太平天国进攻江南和松江前夕；又《王韬日记》咸丰十年（1860）二月十七日致张文虎信中有“近者郭君友松适馆于此”云云^⑨，可知郭友松进墨海书馆应是在这期间，此时他四十二岁，尚未中举。他在书馆供职的时间还比较长，在他中举以后的1879—1881年间，他以“云间郭友松”的名义在墨海书馆所办刊物上发表过三十余篇文章，内容涉及文学、语言、书画、教育、历史、时事和

① 张鸣珂撰、吴香洲点校，《寒松阁谈艺琐录》，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76页。

② 张文虎撰、陈大康整理《张文虎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1页。

③ 《张文虎日记》，第15页。

④ 《张文虎日记》，第66页。

⑤ 《张文虎日记》，第98页。

⑥ 《覆瓿集·舒艺室诗存》，卷四，第3页。

⑦ 《寒松阁谈艺琐录》，第76页。

⑧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7页。

⑨ 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2页。

宗教等许多方面。当然,他不一定是在墨海书馆连续供职这么长时间,期间可能断断续续,但他和墨海书馆的因缘,应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可以说,郭友松虽然仕途上命运多舛,但近代报刊的兴起,给了他除“以卖画自给”和“课徒自给”以外,另一种谋生的本领。他的人生轨迹也和王韬、李善兰等近代知识分子一样,是社会转型时期文人从传统仕途走向经济自立和人格独立的代表之一。

作为一个传统文人,郭友松身上烙有浓厚的儒家思想影响,特别是在家国危亡的关头,他忠义激烈,肝胆轮囷。咸丰十年(1860)六月,当太平军即将要攻占松江的前夕,郭友松曾给王韬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衡素无他好,唯君亲大义,平日辨之甚明,当事赴之甚勇。眼前松城纷纷迁徙,十室九空。衡家无余资,并无他累,不妨同病妻一棹来沪,与吾兄共为壁上观。既未仕于本朝,则天地闲,贤人隐,世外逍遥,自无不可。然而衡不肯为此矣。”他在信中表示:“衡主见坚决,若苏、松无恙,则衡亦无恙;若所居之地已属他有,衡当先杀内子,自经于明伦堂上,来生再与吾兄相见矣。”^①言辞铮铮,掷地有声。不仅如此,他还把“家中几案物件,尽售于人,日着短褐,佯狂市上,有时或歌或哭,市人皆哗呼为‘狂生’。”王韬感叹说:“郭君一诸生耳,尚立志死难如此,足以愧今之为入臣者矣。”并表示:如郭君抗节死,“余当为之收其骨,树一碣于墓曰:‘清故忠烈贞士郭君之墓’。”^②虽然后来松江城破后他并没有如信中所说“自经于明伦堂上”(个中原因不详),但他的上述言行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诚如王韬在日记中所说,“其语出自血诚,非以此为沽名地者”^③。确实,郭友松作为一个传统文人,他的忠君报国之心颇令人感佩。

但郭友松作为一个在西人报馆供职的近代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又有矛盾和复杂的一面。就在他写信给王韬表示要以身殉国的同时,他又要王韬将此信“达之于西士艾君(指传教士艾约瑟),俾知云间郭福衡者,非贪生恶死、不学无术之流,则艾君枉顾之意,亦不可谓无知人之明矣。道路传闻:薛抚军时至沪,又闻徐抚军有书于墨海。又闻吴道宪已让税乞师援苏。两抚军一至、一以书来,亦是此意,未知确否?如此举能行,在英国救灾恤邻,上体上帝之仁心,下收士民之倾戴,不必与加特力教等争胜,而自无不趋如流水矣”。而且“以为艾君之本国,一时虽不能得师,而数百之众,直达苏城,器械之精,兵卒之用命,久为我军称羨,及贼所畏慑”。真所谓病急乱投医,郭友松竟想向英国“乞师援苏”,并希望王韬能从中“聊进一言,纵事不得,九京之下,亦以为快耳”^④。还是王韬看问题比较清醒,他在日记中指出:郭友松所言“乞师之说,不独西国教士无能为役,即公使亦当禀命其国主也”^⑤。确实,郭友松想通过传教士向英国“乞师”的想法未免太过天真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郭友松政治上的幼稚和性格上的迂腐,反映了他对西方的无知和盲信。要之,郭友松作为一个转型期的近代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无疑烙有深刻的时代印记。

二 郭友松交游考述

郭友松一生潦倒,交游不多,如他自己所说,“余玄空人也,飘来飘去,几老江湖,然有二三知己”^⑥。这“二三知己”中,就有一些当时的文化名人。

首先是上文提及的张文虎。张文虎(1808—1885),字孟彪,号嘯山,别号天目山樵,上海南汇周

① 《王韬日记》,第175—176页。

② 《王韬日记》,第178页。

③ 《王韬日记》,第175页。

④ 《王韬日记》,第176—177页。

⑤ 《王韬日记》,第177页。

⑥ 郭友松《玄空经·自序》,上海少年书局1933年版,第1—2页。

浦镇人。他出身贫寒，天资聪慧，学识渊博，但无意仕途，以诸生之名终其一生。他精于校勘，曾受曾国藩之邀，入金陵书局校勘《史记》等书，长达十年之久；并以天目山樵的笔名评点过《儒林外史》，此即小说评点史上有名的《儒林外史》天目山樵评本。他生于1808年，比郭友松大十岁，应是郭友松的父执辈。最初张文虎拜访郭友松父亲柳村先生的时候，友松“侍侧，一少年耳”^①。郭父死后，两人一直保持了联系和交往。道光二十四年，张文虎在给郭友松的信中写到：“客秋于郡西郭晤足下，方自白门回，草草数语别去，时见足下面有晦色，窃意试未必得意。……及八月中在郡，传闻友松已入都，则又恍然。……越数日，从柳溪处获手书，始审行止，则又一喜，非特喜足下之未入都也，又喜得安砚地，从此息心数年，一志读书，不为俗学、俗事、俗说所误，庶几有成。”^②从此信中得知，张文虎开始听闻郭友松已入都应试，颇感失望；后获手书，知其并未入都，顿觉一喜，并要其一心读书，“不为俗学、俗事、俗说所误”。在对待科举和仕途问题上，张文虎作为长辈，要比郭友松远更清醒。上引道光二十六年一封信中也是当时郭友松面临人生困惑和抉择时，写信向张文虎求教，张在回信中以自己的经验告诉他，人如何在困境中求生存，“于无可立足中求立足之地”。张文虎还写有一首《赠郭福衡》诗：“瘦郭多才思，聪明我独怜。拈毫浑得意，脱口即能传。境窄心仍泰，神凝道乃全。春华易为好，落实在秋天。”^③表现了对郭友松才情的赞赏和期许。可以说，张文虎是郭友松的亲长长辈和人生导师。

两人的忘年交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张文虎日记》中有不少他俩来往的记载。除上引日记中所记有关郭友松赴金陵应试他俩的来往外，其他如同治六年（1867）五月十七日，张在日记中记载：“阴。申刻雨一时许，松郡杨太尊上省，送郭友松信。灯下草复。”十九日便立即“至剪子巷拜杨太尊，托寄松信”^④。又同治八年（1869）四月，张文虎赴松江，初三日抵达，第二天初四日就“访祁仰山、郭友松、闵月嵩”。在周边走访了一圈后，十五日回到松郡，又“访钱子馨，因同人城访郭友松，不值，遇诸途。……与友松至会鹤楼茗叙”。第二天又“出晤友松，言南邑学博杨君致意，欲来拜，因不衣冠往访，意似甚笃”^⑤。又同治九年（1870）八月初五日，日记中记“莫鲁斋、倪小云、周孟舆、郭友松来”，隔天初七日就“回看莫鲁斋、郭友松……”等^⑥。同治十年（1871），张在日记中还有“写寄郭友松信”等记载^⑦。所记虽是片言只语，但反映了两人之间的持久交往。直到张氏晚年，“比予寓居复园，君以不良于行，过从甚稀，盖亦颓然作老翁状矣”^⑧。此处所谓“不良于行”没有明说，估计是吸食鸦片之类的颓废行为，时间则在张文虎“寓居复园”期间。按，张文虎《舒艺室诗存》卷七有《乙亥、丙子两年并在复园度夏，子馨尝助予视宅，未就。去秋，子馨病故，家属皆迁回金山，即招予住复园，今夏四月始来，赋此为纪》一诗^⑨，细审语气，诗题中“今夏”应在乙亥、丙子之后一年，即丁丑年。丁丑为光绪三年（1877），张文虎寓居复园应在这一年夏四月。又上引诗后紧接一诗为《在金陵日，多忖愚纳妾者，刘治卿观察劝尤切。及归里，老友朱贡三钥及宗人张凤山鑫辈，复屡以为言，黄子脊太守安谨力持之。夏四月，倪姬来归，遂挈居复园，漫成一律寄诸君》^⑩，也是指同年夏四月张氏挈倪姬居复园。再，上引诗后第五首诗为《坡公生日，招仇竹坪太史炳台、郭友

①⑧ 张文虎《怀旧杂记》，卷三，第7页。

② 张文虎《舒艺室尺牍偶存》，转引自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第619页。

③ 《覆瓿集·舒艺室诗存》，卷三，第2—3页。

④ 《张文虎日记》，第91页。

⑤ 《张文虎日记》，第177—178页。

⑥ 《张文虎日记》，第229—230页。

⑦ 《张文虎日记》，第263页。

⑨ 《覆瓿集·舒艺室诗存》，卷七，第15页。

⑩ 《覆瓿集·舒艺室诗存》，卷七，第16页。

松孝廉、吴吉卿震、章次柯来、沈跃斋祥龙、三明经尹子铭署正鑒惠、钱义泉中书廉、闵颐生上舍萃祥，小集复园》^①，后世以阴历十二月十九日为“东坡生日”，这一天张文虎招集了包括郭友松在内的文友“小集复园”，以纪念“坡公生日”。也就是说，光绪三年（1877）十二月十九日，张文虎还在复园招待过包括郭友松在内的一群朋友。虽然张氏说他寓居复园后，因郭“不良于行，过从甚稀”，但他们还是见过面，而且见到的已是“颓然作老翁状”的郭友松。此时郭友松正好虚岁六十岁，这和郭友松七十岁生日时朋友在祝寿诗里称赞他身体如何硬朗并不矛盾，因为张氏在这里是把他和当年拜访他父亲时见到的“少年”情状相比，所谓“忆予与熊露翁访柳村先生，时君侍侧，一少年耳。比予寓居复园，君以不良于行，过从甚稀，盖亦颓然作老翁状矣”^②。估计张氏和他的交往也就差不多到此时为止。

其次是王韬。王韬（1828—1897），原名利宾，后改名瀚；1862年逃亡香港后改名王韬，字仲弢，号天南遁叟；五十岁后自号弢园老民，江苏苏州甫里镇人。郭友松和他的交往是因为他们曾是墨海书馆的同事，王出生于1828年，比郭友松小十岁。王韬曾在《弢园老民自传》中引海宁李壬叔、宝山蒋剑人、江宁管小异、华亭郭友松四人为“莫逆之交”。既称“莫逆之交”，关系应非同一般。在《王韬日记》中，记录了他俩日常生活中相交的很多细节。他们或相互切磋学问，如咸丰十年（1860）正月二十三日，“郭友松、钱莲溪从云间至。企念已久，一旦相见，把臂如故。夜，薄具四簋，招之小饮。酒间偶征典故，言及十三经中无‘灯’字、‘箸’字，只有烛庭燎炬火而不及灯，只有刀匕挟木聿而不及箸，未知缘始在何时？更言元宝虽铸造在元代，而书籍载之者甚少”^③。或一起纵论时事，如同年闰三月十四日，“冒雨入城，访郭友松。先至静渊家，则静渊父子高卧初起。坐良久，友松始来，抵掌剧谈时事，叹不可为”^④。或相聚清谈闲聊，如同年正月二十六日，“夜，往郭友松寓斋闲话”；第二天“薄暮，往约友松、静渊同往酒楼小饮”；第三天“清晨，郭友松、薛静渊、沈协卿来，约入城散步，静渊以慢首见饷。继至茶寮小啜，得晤宋小坡，闲话久之。午后……继与友松往候张筱峰广文，清谈移晷。……薄暮出城”。连续三天，相聚神聊，以至第三天从清晨聊到午后，又从午后聊到薄暮，正如王韬在此日日日记中所说：“是日可谓畅游矣。”^⑤或彼此馈赠礼物，如同年正月十日，“郭友松福衡书来，以近人诗集及古墨相馈”；第二天十一日王韬便迫不及待地试墨：“夜，试友松所馈墨，香韵清远，为方氏牛舌古墨中佳品。”十六日中午又试了一次^⑥。一个月后，郭友松又“有书至，并寄胡天游《石笥山房集》三册”^⑦。一个慷慨相赠，一个懂行识宝，真所谓惺惺相惜，他们之间这种相处和交友的方式，为王韬所说的“莫逆之交”作了生动的注释，也为当时文人之间的交往提供了生动的案例。

虽然郭友松大王韬十岁，但郭非常珍惜和王韬的友谊。一次王韬作云间之行，郭极尽地主之谊，一路相陪，饮酒品茗，除“抵掌剧谈时事”，友松还投王韬所好，“特同往一家”“绰号为武则天”的“吸片芥”吸食鸦片^⑧；第三天“午后，诣茗楼小啜，郭友松偕其友叶小山同至”。“茶罢，仍往武氏吸片芥”，临别时友松不仅“以柜粒二匣、鲁津伯一块相饷”，还“送至城外，意甚殷拳。再往茗寮作卢全七碗饮，别时犹依依不相舍也”。难怪王韬感叹说：“自来才人断无无情者，于友松见之益信！”^⑨“才人”郭友松对朋友的真挚感情由此可见一斑。

① 《覆瓿集·舒艺室诗存》，卷七，第18页。

② 《怀旧杂记》，卷三，第7页。

③ 《王韬日记》，第134页。

④⑧ 《王韬日记》，第161页。

⑤ 《王韬日记》，第135页。

⑥ 《王韬日记》，第133页。

⑦ 《王韬日记》，第143页。

⑨ 《王韬日记》，第163页。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王韬与张文虎之间的交往,还是郭友松无意中牵的线。王韬比张文虎小二十岁,作为晚辈,很早就对张的才名仰慕已久,咸丰十年(1860)二月十七日,曾写信表示对他的敬仰之情:“此间如蒋、李二君,每及执事(指张文虎),辄盛口不置,中心藏之,未面已亲。”为“瀚知执事,或执事未必知有瀚也”而遗憾不已。后郭友松进墨海书馆供职,一次谈话中无意间从郭友松处得知张文虎亦知王韬:“及近者郭君友松适馆于此,谈经之暇,偶述执事曾道及瀚,辄加心许,未尝口疵。”这才让王韬鼓起勇气提笔给张文虎写信,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执事薄功名,捐嗜好,耽玩元理,接斥尘嚣,矫然如天半朱霞,云中白鹤,可望而不可即。何幸滥及鄙人,双情交映,辱一言为知己,结异地之神交。吾生所快,尚复何恨,不自揣量,愿附縢屨之末。”^①同年三月七日,王韬便收到了张文虎的回信,这封信被王韬记录在日记里,“以为神交之始”。回信除自谦外,称赞“管(小异)、李(壬叔)、蒋(剑人)、郭(友松),皆负殊才,同兹羁旅,尺蠖之屈,庸复何伤”。更称颂王韬“藻采缤纷,鲸铿日丽,率尔投简,已睹一斑。记述所垂,诂让前哲,尤愿执事亟为之矣”^②。自此,便形成了又一个以张文虎为中心的文人交游圈,这个交游圈除张文虎外,其他几人都曾供职过墨海书馆。

再就是张鸣珂。张鸣珂(1828—1908,《艺林年鉴》作1829—1909),原名国检,号玉珊,一字公束,号寒松老人,浙江嘉兴人。曾在淮军名将刘秉璋手下做过幕僚,好吟咏,嗜书画,他和郭友松的交往主要就在书画方面。其所著《寒松阁谈艺琐录》,广泛记载清代书画家事迹,是研究清代书画家的一份重要参考资料,书内就记载了郭友松和他的一段交往:“予从淮军,携家寓松江。友松问居停主人曰:‘汝家寓一何人?我见其书籍多于筐篋,胸中定有卷轴,予欲往访之。’”可见他俩的相识是在张氏“从淮军”做幕僚而寓居松江时,缘起则是对于书的共同嗜好。郭友松生性嗜书,但因家贫无藏书,所以一见张鸣珂家中藏书如此丰富,自然钦羡不已。在交往中,张氏对郭友松的品行和才学都非常激赏,称赞“友松有至性,尝刲股以疗母疾,家贫课徒自给。下笔千言,疾如风雨。扣以典故,必举某书某卷,约在某页,按之十不爽一。奇才也”。其品行之优,才情之盛,学问之深,都非常人能比。张鸣珂本人工于书画,他对郭友松的画艺也非常欣赏,称赞郭友松“兼通六法,笔致古茂,予谓其得力于明人,甚喜。为予画古佛及南阁祭酒许叔重小像,皆可宝也”^③。其绘画方面的才能同样不可小视,遗憾的是迄今没有发现他的画作。张氏小郭友松十岁,两人有过直接交往,他的话应该不是夸大溢美之辞。

郭友松交游中还有一位比较重要的人物是李小湖。李小湖(1820—1878),名联琇,字季莹,号小湖,江西临川人。道光二十年(1840)中举,二十五年(1845)中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调福建学政,不久擢大理寺卿,仍留视学。咸丰六年(1856),出任江苏学使。致仕后出任钟山书院山长,著有《好云楼》初集、二集。张鸣珂在《寒松阁谈艺琐录》中曾记载说:“临川李小湖先生联琇,视学江苏,以《鸚鵡来巢解》试士。友松于试卷后,图其形以进。学使视之,诧曰:‘此宋画院本也。’亟首拔之,并赋《鸚鵡行》赠郭生云:‘键闥动弥月,谓我优且闲。岂知日接百千士,尤甚劳攘风尘间。展卷恒达旦,谓我洽古欢。岂知遮蔽尽帖括,更苦判牒罗纷繁。多君笔能鸚鵡语,为我衣帻鸚鵡舞。兴酣忘在凤味堂,鸣跃专场夸觔距。亭林寂寞书台倾,峰泖逸气生狂生。腹拄万卷消不得,槎枒碑碣合由平。吐词盈纸骋雄怪,纸尾为图诟嫌隘。危巢枯叶随所成,试席深丛出佳话。林宗合附元礼船,山谷欣题子舟画(山谷有戏咏子舟两竹两鸚鵡诗)。远哉遥遥忆跼蹐,风帘帘静飞鸟无。曩游回首已如梦,嘲啖惊枕闽山隅。宦闽虞愿感迁地,拭目得君愿聊慰。凤翔千仞乃

① 《王韬日记》,第142页。

② 《王韬日记》,第150页。

③ 《寒松阁谈艺琐录》,第76页。

其游，毋入鸟群争喧啾（勉以修谨毋自放云）。’”^① 本以为这是关于郭友松的传说，未必尽信，但查李小湖《好云楼》初集卷八“吴槎草上”，此诗赫然在目！诗题为《云间校士题郭友松茂才福衡画鹁鸽卷后》，^② 可知张氏所言不虚。

此外，同卷“吴槎草上”还有《友松赠二律，顺逆次余和樾峰太守韵，遂用其韵答之》二诗，其中首二句为：“胜事喧传李郭舟，仙人入画碧波浮。”句下注云：“友松为余绘李郭仙舟事于簏。”诗中还有“早日奇童羨苕发，几回哲匠采岩幽。好风待送青冥去，暂卧元龙百尺楼”、“不独辞条艳选楼，谈经说史备探幽。况通杂艺都成趣，愧惠贫粮亦有秋”等语^③，都是称赞郭友松有着多方面的才情，看来民间有关郭友松的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并为张文虎所说的“李小湖学使特赏异，延入幕”做了很好的注释。

又，同卷“吴槎草中”还有《题黄鹤楼明经金台扁舟访友图，明经著有木鸡书屋骈文四集，友松为余招延入幕，时年六十九矣》和《鹤楼示所作君山梅花书院宴集记，爰题其后送行并柬同人》二诗，后者最后一句诗句为“欲补丹青少郭熙”，句下注云：“友松旋去馆。”^④ 说明此时郭友松已辞馆。“吴槎草上”所写诗作为“自丙辰秋至丁巳春”，即1856年秋至1857年春；“吴槎草中”所写为“自丁巳夏至戊午春”，即1857年夏至1858年春。上、中两编所收诗作为1856年秋至1858年春，前后也就两年不到。此时郭友松三十八九岁左右，其在李小湖幕中也就两年不到时间，“旋去馆”正和张文虎所说的“未几辞归”相合。郭走前还为李小湖招延了一位“时年六十九”岁的黄鹤楼明经入幕。郭友松虽入幕时间不长，但在他的人生经历中也是很重要的一段。1860年，郭在给王韬的信中还说起“徐抚军又有书于吾兄，亦一知己，今日聊以分忧，犹衡之有小湖老师在苏也”云云^⑤。可见两人的“师弟”之情还是颇深的。

这里还需补充说明的是，李小湖还曾想延请张文虎入幕，也是请郭友松传言。张氏于同治四年（1865）闰五月十一日在日记中曾记载说：“刘伯山来，言谒见钟山书院李小湖山长，殊念及，属致声。山长昔为江苏学使，以郭友松言，颇有收罗之意，予适以病辞，不谓犹能记忆也。”^⑥ 两年后，即同治六年五月十九日，张氏又在日记中记道：“至钟山书院拜李小湖山长。十载神交，相见恨晚。”^⑦ 一句“相见恨晚”，把张文虎和李小湖之间，以及他俩和郭友松、王韬之间那种彼此惺惺相惜的情感全盘托出，生动地体现了旧时文人间的亲密友谊和良好品行。

三 作为杂论家的郭友松

以上我们初步勾勒了郭友松的大致生平事迹和交游，这里再就其著述作一粗浅的探讨。

郭友松当然首先是位小说家，他的《玄空经》是小说史上一部很独特的作品。同时，他又是一位出色的画家，可惜他的画作所见不多，其作品也未引起世人的注意。除此之外，王韬在其1860年正月二十六日日记中曾记载说：“友松精深于经学，所著已有数种，皆系细稿，漫不收拾，间为门弟子辈携去，殊可惜也。”^⑧ 可见郭友松还写有经学著作多种，惜散失未传。今能找到的有他发表在墨海书馆所办《益闻录》等刊物上的文章三十余篇，这些文章涉及面很广，大致可以用“杂论”将其概括。这里就这些杂论作一归纳和分析，有关《玄空经》另再撰文论述。

① 《寒松阁谈艺琐录》，第76页。

②③ 李小湖《好云楼》初集，咸丰十一年（1861）恩养堂藏版，卷八“吴槎草上”。

④ 《好云楼》初集，卷八“吴槎草中”。

⑤ 《王韬日记》，第176页。

⑥ 《张文虎日记》，第44页。

⑦ 《张文虎日记》，第91页。

⑧ 《王韬日记》，第135页。

如上所述,郭友松的杂论涉及面很广,按大的方面归纳一下,大致可分为文学艺术、历史故实、时事评论和文化教育四个方面。下面分而述之:

先说文学艺术。这方面的文章有《古文体例论》、《四六体例论》、《中国方言古今同异考》、《论画》、《书法论》、《历朝字学好尚考》等。前三篇为文学语言方面,后三篇是有关书画艺术的。《古文体例论》一文首先论列古文和骈文的界限,并历数历代论古文体例的代表性著作和选本,辨析其各自的特点和流变,最后归结说:“要其本原,文以传道。苟不知道之当然,而争胜文字间,是犹唐花之娱目,淫哇之乱聪,不足取也。古人文成而体例由之以立,求诸道而不求诸文,文自无不工也。今人援体例而文章仿之以成,务为文而不明乎道,文虽工而无所用也。”^①《四六体例论》所论思路也大体相似,只是所论对象是四六体即骈文,在指出历代四六体特点之后,文章最后总结说:“欲为四六,先为古文,未有不能古文,而反善四六者。其言先不清,其气先不贯耳。故无意于偶对,而笔下适得之者,天机之不可遏也。极力于铺张,而辞下多杂芜者,俗学之不足取也。”^②《中国方言古今同异考》一文在历数历代方言和方言著作流变后,高度概括说:“方言不一,而可括以两字,曰‘南北’。南音清而轻,多浮响;北音浊而急,少曼声。”并指出方言的重要性在于:“盖不独入国问俗,不明方言,无以酬答;即考古证今,不知方言,亦无从论辨。”^③文章思路清晰,文字简洁,立论精辟,显示了论文作者较好的学问素养和文章技巧。

另外三篇关于书画的文章也有作者自己的见解,《论画》一文不仅论证了“画始于人物,而花鸟次之,山水又次之”;而难度“莫难于山水,而人物次之,花鸟又次之。神似者上也,形似者次也,苏氏所谓作画而必此画者,见与儿童邻也”。同时,还论证了“画先于书者”,因为“‘六书’之法,一曰‘象形’;‘象形’者,形象也,象其形而象之,即画也”^④。又《书法论》和《历朝字学好尚考》二文,在历数书体变化和历代论书著作后,不仅梳理出书法演进的轨迹:“自李斯小篆始,一变而为程邈之隶书,王次仲之八分,至蔡邕而有真书之遗意,其与汉时之章草,伯英之草书,相后先焉。钟元常实为真书之祖,即楷书之祖。厥后而晋之诸王及怀素等,始传草书。盖篆最先,而草最后。又有飞白,则蔡中郎所作也;双钩,则梁元帝所作也。此皆书之旁门……亦为不可废之书法也。”而且总结出“要之,书家亦分南北二宗,南书之宗,自羲之始,后之颜、柳得其真。北书之宗,自索靖始,后之郑、薛传其法”^⑤。或谓“南钟北索”,钟再传之王右军^⑥。如上已述,郭友松是一位技艺高超的画家,同时他也是擅长飞白书的书法家,1886年《益闻录》中刊有“南汇芷顾麟”写的《奉怀娄村郭友松同门兼乞所作飞白书》诗,顾麟和郭友松同门,诗注云“座师”同为“刘臧三先生”,顾麟“受知在丁卯”,友松“受知在癸酉”(正与郭友松“癸酉始登贤书”相合)。诗云“树帜文坛按墨兵,海飞石走鬼神惊。笔锋秃尽中山兔,不断春蚕食叶声”^⑦,可见他的飞白书还非常精彩。所谓飞白书,是指笔画中丝丝露白的一种书法,像是枯笔所写,相传为蔡邕所创。正因为郭友松自己能写字作画,因而他有关书画的论述也自有个人独特的心得体会。

其次是历史故实。这方面的文章有《成汤祷雨论》、《屈原论》、《汤伯闲论》、《海忠介治吴论》、《汤文正毁淫祀说》、《陶侃温峤论》、《周处论》、《郭子仪李光弼论》和《历朝冠服制度考》、《梨枣镌书考》等,这类文章大都以历史上一些名人故实为题,或褒扬忠介,或辨明是非,借题发挥,借古喻

① 郭友松《古文体例论》,《益闻录》1880年第34期。

② 郭友松《四六体例论》,《益闻录》1880年第38期。

③ 郭友松《中国方言古今同异考》,《益闻录》1881年第117期。

④ 郭友松《论画》,《益闻录》1881年第94期。

⑤ 郭友松《书法论》,《益闻录》1881年第102期。

⑥ 郭友松《历朝字学好尚考》,《益闻录》1881年第108期。

⑦ 顾麟《奉怀娄村郭友松同门兼乞所作飞白书》,《益闻录》1886年第573期。

今；少数两篇是有关古代制度方面的。褒扬忠介的如《屈原论》，借屈原遭谗之历史，说明“谗人之害贤人为甚力，而贤人之见困于谗人为甚亟，至谗人之说行，而贤人之身斥。于是谋国者皆为小人，而无一贤人，其国并可谓无人，而其国亦遂败亡于群小人之为谗人矣”^①。又如《海忠介治吴论》和《汤文正毁淫祀说》二文，一借海瑞治吴时“遇事不挠，见恶必斥”，举凡“缙神之请托，狱讼之不明，书差之横恣，公皆一一痛惩之”^②；一借汤文正抚吴日“躬诣其地，焚祠伐象，散诸僧道，其托巫覡以取财者，尽法惩之”^③，二人前后辉映，“庶足相匹”。

辨明是非的如《成汤祷雨论》和《周处论》二文，前者针对明嘉靖间进士张南轩认为成汤祷雨时“剪发断爪，身为牺牲”，是“毁伤父母遗体，汤之圣必不出此，遂以此事为野史谬谈”，指出所谓“父母遗体，不可毁伤，谓争斗颠踣之属，绝筋折骨，无端而损伤耳。若用以昭事，且为天下之人请命，而惜此爪发之微，正恐成汤之圣所为决不若是之吝也。况古人揃爪髻发之为，平居以之修容，且不之禁，居丧反废，以其无借此修饰之功耳。若在今日，修爪剃发，人人皆然，将尽谓之不孝乎？”^④可见张氏之论实为“迂论”也。文章不长，但层层展开，逻辑严密，驳论非常有力。《周处论》一文也是如此，周处年少时纵情肆虐，为祸乡里，乡人曾称之为“三害之一”，但在郭友松看来，“天下异才，其少时不皆驯谨庸流，不能成大业，而亦不能为大恶也”，而“一旦改行为善，立节千古”。像周处这样，“明知其死，而不敢逃死，其从容赴义，不更较凡为殉节者加一等哉！”^⑤论述有力，语言铿锵，更增加了文章的感染力。

再有是时事评论。这方面的文章有《富国强兵策》、《中俄军事议》、《理财论》、《赛马论》、《御火说》、《返朴归真论》、《论禁妓馆》、《论妇女不宜入茶肆》等。其中前两篇是有关国家大事的，《富国强兵策》一文先列举了一些世俗的肤浅狭隘之见，如“自海国和约以来，人见西人之为商而不为农，重税而不重赋，遂谓与中土殊者，此目论也”；“又见轮船之坚而且速，火炮之利而有准，电音之四处可达，西兵之百战不疲；又谓骑战非所长，弓矢不足习，谍探不待设，将士不相敌者，亦目论也。近日机器之局，格致之书，几于邑有其法，家有其文，而且报事之馆日开，巡捕之设益广，西人之耳目手足，犹中人也，而谓其别有策以致富强者真矣”。这里，所谓“目论”，即肤浅狭隘之论；所谓“真”，即荒唐、荒谬之意。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富国强兵呢？郭友松除了举《管子》、《商子》、《墨子》三书“可以采而用之”外，提出“更有不足言策，而真乃妙策者”，这就是小说《希夷梦》一书，“于九卷中托为闻丘仲师所上浮石之武略，有五纲四十目。其五纲：一曰修内，二曰理外，三曰出征，四曰临敌，五曰还军。修内之目：一曰任贤，二曰重农，三曰慎刑，四曰薄赋，五曰敦礼，六曰养士，七曰辨材，八曰除异。理外之目：一曰谨边备，二曰复屯田，三曰禁军需，四曰安远人，五曰慎取予，六曰练士卒，七曰隐谍，八曰攻心。出征之目：一曰正名，二曰任能，三曰一士志，四曰亲信将吏，五曰备要，六曰养气，七曰选锋，八曰向导。临敌之目：一曰详察，二曰相地，三曰风向，四曰分合，五曰败愈奋，六曰胜愈慎，七曰善久，八曰无暴。还军之目：一曰推功，二曰赏荣，三曰安吏，四曰崇俭，五曰修城壕，六曰实精炼，七曰修教化，八曰任廉洁。此四十目者，虽意在兵，而富国之道，实寓于此”^⑥。这里所说小说《希夷梦》又名《海国春秋》，作者汪寄，约活动于清乾嘉年间，此书有嘉庆、光绪年间刊本、上海苏报馆和大达图书供应社印本问世。查小说《希夷梦》，其第九回正有所谓“救浇漓立议修文德，整散漫挥毫著武谋”的大段描写，除个别文字有出入外，内容基

① 郭友松《屈原论》，《益闻录》1879年第30期。

② 郭友松《海忠介治吴论》，《益闻录》1880年第52期。

③ 郭友松《汤文正毁淫祀说》，《益闻录》1880年第48期。

④ 郭友松《成汤祷雨论》，《益闻录》1880年第44期。

⑤ 郭友松《周处论》，《益闻录》1880年第40期。

⑥ 郭友松《富国强兵策》，《益闻录》1880年第80期。

本相同,而且所言更为详尽具体^①。这里,郭友松借小说《希夷梦》所写,不仅表达了他对富国强兵之策的思考,同时也反映了他对作为“小道”的小说的熟悉和关注,可见他创作小说《玄空经》也非偶然。至于《中俄军事议》一文,更是一篇论述当下时事的论文,文章提出处理中俄两国间关系的准则:“在中国宜平心从事”,“在俄亦当审利就机”,而且“中土文教之邦,本不好言戎事”,“俄国尚希腊之教……教本宽柔,而宽柔之道,尤以杀人为戒,《十诫广义》,备列其说。故得取彼国所奉之教,以释其弊端,或亦管窥之一隙也夫”^②。

其他《理财论》、《赛马论》和《御火说》,是有关百姓经济生活、日常娱乐和城市安全的;《返朴归真论》和《论禁妓馆》、《论妇女不宜入茶肆》,是关于社会风气的;这些文章都是针对当时社会生活和风尚,阐述了作者对于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它反映了郭友松作为一个报人,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和文章出手之快。这里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赘述。

最后是文化教育。这类文章也涉及好些方面,如《愚孝论》、《出妻论》、《择友论》,这是有关家庭和社会伦理的;《教子论》、《读书论》、《历朝义学沿革考》,这是有关家庭和社会教育的;《释圣》、《释天》、《上帝说》、《书景教碑后》,这是有关宗教问题的。

有关家庭和社会伦理的,《愚孝论》和《出妻论》分别对古代的“愚孝”和强加于妇女的“七出之条”予以了抨击,前者认为历史上所传种种“割股奉亲”之事,乃是“陷亲以不仁之奉,居己于无知之徒,又乌得谓‘孝’乎!”并进一步指出:“人之奉其亲,犹人之承大造,大造极以生命为重,即父母亦极以子命为重。大造以自绝其生命为极恶,亲心亦以子之濒于死亡为最悲,然则舍愚孝而孝可言矣。”至于“伪为孝行之徒,更下于愚孝之徒矣。愚孝且不可,况敢伪孝也耶”^③!后文提出:“以大义论之,妇人于夫为人伦之首务,断无可出之道。重之以相攸,要之以媒妁,告之于父母,宣之于亲友,何等郑重!而一有不合,遂挥而去之,亦太过矣。”^④不仅“七出之条”不可行,即三出(指妇女犯有不孝和淫、妒三罪)亦不可行。两篇文章都推理严密,驳论有力,酣畅淋漓,极有气势。

有关家庭和社会教育的,《读书论》一篇尤其精彩。此文虽然不长,但详细罗列了历史上种种读书之法:如“或谓读书当如朱子之读书法,此则循序之道也;或谓当如苏氏之八面受敌,此则精进之功也;或谓于我胸中,先分数类,将所读之书,逐部挨入,积久自多,此合万殊而为一贯也;或谓即我分寸,先立主见,凡所读之书,逐次引证,取裁自精,此以一贯化万殊也”。又谓“能读书者,史不乏人,最爱《北史》李之挾云:读书非以弋名,但异见异闻,心所愿也。此真善读书者”。又谓“古之善读书者二人,一则陶渊明之不求甚解,一则孔明之独观大略,必若训诂考据之儒,句栉而字比之,未免日不暇给矣”。真可谓纵横捭阖,旁征博引,显示了作者广博的知识结构和对于读书的精辟理解。而种种读书之法归结到一点,在善读书者,“能集众书而要其成,能会众说而通其理”^⑤。此可谓深得读书三昧之论。

有关宗教方面的,以《上帝说》一文为代表。该文引经据典,引用了儒家经典如《四子书》(指《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四书)、《礼经》、《易》、《尚书》等有关“上帝”一词的释义,先驳斥了后儒或以“形天为帝”,或以种种异说相混的似是而非的说法,指出“征诸经传,知上帝者,主也。洪濛未辟以前,已有此主。人物,主造之人物也。终始,主为之终始也。恩满五洲而莫之缺,威行万古而莫之抗。无可颂,无可赞,惟有一心一意以奉之而已”。同时,该文还引用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的著作,谓“旧曾读太西利氏《天主实义》十卷,其发明上帝之义,至精至确,惟近儒多有误以形

① 汪寄《海国春秋》(即《希夷梦》),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134页。

② 郭友松《中俄军事议》,《益闻录》1881年第82期。

③ 郭友松《愚孝论》,《益闻录》1880年第76期。

④ 郭友松《出妻论》,《益闻录》1881年第91期。

⑤ 郭友松《读书论》,《益闻录》1881年第95期。

天为上帝者，故改称上帝为天主，而其论始终本末之义，则未尝或异也。今历论四子六经之言上帝者如左，而复及于利氏之说，试取而观之，诚所谓东海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者，益可晓然于上主之不得淆惑于异端之论也已”^①。郭氏在此明显地继承了利玛窦“以儒释耶”、“儒耶互释”的策略，为找到并辨别“上帝”一词在中国儒家经典中的本义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难怪文后有跋语指出：“‘上帝’二字，原本六经，系指无形无声之主宰而言。语意本极昭著，奈后儒释此二字，每以形天之说相浑，致有形无形之间，猝难辨别。用（因）是吾教中通称之曰‘天主’，以别乎有形之苍苍。兹得茸城郭孝廉见惠《上帝说》一首，引经据典，洵足与教旨互相发明。盥读既毕，即付手民，以供众览。本馆附跋。”^②可见编者对此文的高度赞赏和重视。

以上我们粗浅分析了郭友松在《益闻录》上发表的数十篇文章的大致内容，综观这些论文，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郭友松在很多文章中，都会在大量引用我国传统儒家经典的同时，结合西方的制度和学说，加以比较分析和论述。上引《上帝说》一文，就是典型的个案。该文把儒家经典有关上帝的论述和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的《天主实义》相互引证和发明，对后儒有关上帝的种种谬说进行了细致的辨析和抉伪，是一篇“以儒释耶”的典型范文。

同样的例子还可举出《择友论》一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先引用了孔子所云“损者三友，益者三友”的说法，认为“朋友为五伦之一”，“人生于世，父兄师长而外，得益于友者实多。然非无端而能受其益也，始必窥其本原之地，继而察其行习之间，诚可交矣，然后友之”。作者还特意指出交友中的一种不良倾向：“尤可笑者，势利之交，利尽则交疏，势亡则交绝。”因此告诫读者：“君子之于友也，必志同道合者，然后友之。”而所谓“友也者，友其德也，诚为千古择友要语”。紧接着笔锋一转说：“犹忆泰西利玛窦有《友论》一篇，其书刻入《文学初函》中，而《昭代丛书》中亦曾采之。语语警醒，令人神往。如云‘友乃第二我’，又云‘既为友，何一贫而一富？’皆足以砭俗人之失，而宽有道者之心。其书具在，试取而诵之，其于交友之道，足以无失。”^③此文同样是“儒耶互释”的范文，作者在儒家学说和西方传教士著作之间自由出入，游刃有余，信手拈来，皆成文章。

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如《成汤祷雨论》、《理财论》、《释天》、《富国强兵策》、《历朝义学沿革考》、《返朴归真论》、《历朝冠服制度考》、《御火说》、《赛马论》等，都有这方面的精彩表现。看来，郭友松作为一个传统士子兼西馆报人，不仅谙熟我国儒家经典和传统文化，而且还比较熟悉西方传教士著作及其思想学说，他虽说不上是学贯中西，但起码可说是学兼中西。这正是时代及其特殊的经历在他身上所烙下的鲜明印记。

要之，《玄空经》作者郭友松不仅生平事迹可考，而且其交游也不乏当时的文化名人，他在读书应试的同时，还创作小说和书画作品，并写下了大量学兼中西的报刊文章，可说是一个集传统士子、民间才子和西馆报人于一体的近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在他身上，汇聚了社会转型时期一个传统文人向近代知识分子过渡的诸多时代特征。今天，我们透过对他和王韬等人的个案研究，正可以追寻和还原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心灵轨迹。只是相比王韬，他还远未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作者简介] 孙逊，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发表过论文《从〈何典〉到〈玄空经〉：我国吴语讽刺小说的重要一脉》等。

(责任编辑·石雷)

① 郭友松《上帝说》，《益闻录》1880年第57期。

② 郭友松《上帝说》文后“本馆附跋”，《益闻录》1880年第57期。

③ 郭友松《择友论》，《益闻录》1881年第93期。